

《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之史料價值——以抗戰前期為例

蘇聖雄 國史館助修

一、前言

蔣中正是中國現代史、臺灣史上極為重要的人物，其掌權甚久，影響層面大，與其相關之史料著作亦繁。國史館職司總統副總統文物之典藏、編纂，因而對蔣中正等歷任總統的史料蒐集、整理、研究不遺餘力。當前臺灣政治禁忌解除，史料充分開放，尤其蔣中正個人的史料如日記、書信、檔案大多公開，為重新整理其史料之良好時機。爰是，國史館館長呂芳上領導組成《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編輯委員會，積極進行年譜長編編纂工作，於每月召開編輯委員會一次，統一體例，相互攻錯，以求完善。初稿完成，並請史學專家審查，以求精進，避免重大錯漏。2014年12月，年譜長編前6冊出版，編撰內容至抗戰前期的1941年，也就是蔣中正55歲之時。

年譜為中國傳統史學體例，編者藉此來呈現譜主個人的生平事蹟。長編體始於司馬光撰著《資治通鑑》時，其請助手將所有材料按年編纂，稱作長編，之後再作考異，最終由司馬光一人刪定成書。因此，長編原本是編寫編年體史書時，所進行之前置作業、編纂程序。其後，長編體成為一種史書獨立體裁，如《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等是。（註1）國史館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是希望作為日後撰寫蔣年譜或蔣傳之張本，故可視之為日後著作的前置作業，惟其體例一貫，內容完整，故亦可

視為一獨立著作。

以蔣中正為中心的年譜、年譜長編相類著作，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事略稿本》、《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等，這些著作，詳略互見，皆有其特色，尤其《事略稿本》，篇幅浩大，摘錄大量蔣中正的日記、與各方往來電文等，深具史料價值。本文將國史館出版的《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以下簡稱《蔣年譜》）與這些舊作相互對照，探究《蔣年譜》的史料價值。為便於聚焦，及考慮到目前已出版的年分，討論範圍集中於抗戰前期（1937-1941）。

二、補充缺漏或不足

《事略稿本》為蒐羅蔣中正史料最全的年譜長編初稿，其包羅時間，自1927年至1949年，上限可與毛思誠之《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相連結。惟《事略稿本》1937年下半年並未出版，且缺1939年整年，因此，《蔣年譜》可補足《事略稿本》缺漏之處。

其次，《蔣年譜》本身參考了《事略稿本》等著作，站在巨人之肩，並嘗試在史料上再做延展。如抗戰時期，王世杰、徐永昌、陳誠等文武要員，參與機要，《蔣年譜》參證這些人的日記，補充了一些決策時鮮為人知的過程。如1939年3月4日，蔣中正與軍令部部長徐永昌談時局，提到：

「中央放棄武漢遷移重慶後，則抗戰時期愈長愈好，以短期內如果和平，則中央對內對外皆不及準備與佈置。若中央掌握四川，果能建設進步，則統一禦侮更有把握矣。」

（引自《徐永昌日記》，收入《蔣年譜》，第6冊，頁37）可見蔣並不如一般所想，希望戰爭及早結束，其反而有戰爭太早結束將不及布置準備之想。又如1941年5月18日，蔣主持軍事會報，對何應欽、張羣等軍政要員「堅決認為德必攻蘇，日必南進，美必參戰」（引自《徐永昌日記》，收入《蔣年譜》，第6冊，頁552），呈現蔣對時局判斷的精準（自然也有許多判斷失誤之處），而德國的確於該年6月22日對蘇全面開戰，而日軍則於12月8日偷襲珍珠港，大舉南進，美國隨後對日宣戰。除了要員的日記，《蔣年譜》亦利用了相關人士的回憶錄、訪談錄及當時的報紙等相關史料，回憶錄如《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顧祝同的《墨三九自述》，訪談錄如《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報紙如《中央日報》、《武漢日報》、《大公報》等是。

再者，《蔣年譜》所立綱目，不避對蔣中正可能產生不利評價之情事。如1938年6月初，日軍於徐州會戰末期沿隴海鐵路一線快速西進，蔣中正為避免日軍過度延伸影響武漢防禦，下令破壞黃河河堤，阻止日軍續進。這個命令，在當時諱莫如深，且國軍反而宣傳是日軍所為，因此在中方相關著作，長期未見真相。《事略稿本》或《總統

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等，對蔣中正下令決堤皆無記述，想當與時代背景有關。《蔣年譜》則毫不避諱，於6月4日立綱「考慮隴海路國軍撤退及中牟掘堤」，日文謂「核定作戰方案，曰：『隴海路敵軍，其果停頓乎？中牟掘堤，汎濫至周家口，其效果如何？此次我軍撤退愈速，敵進將更遲緩，或不敢進逼洛陽矣。』」（《蔣年譜》，第5冊，頁538）6月9日則立綱：「國軍於花園口決堤，阻撓日軍西進。」日文謂：「為阻撓日軍沿隴海線西進，先生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程潛破壞黃河大堤以阻滯日軍。第一戰區第二十集團軍（軍長商震）參謀處長魏汝霖負責監工，新編第八師（師長蔣在珍）和一個工兵營負責執行挖掘和爆破任務。本日，炸堤成功，黃河汎濫，日軍各部停止追擊。」此外，日文並不避諱決堤造成人民的損失，謂：「花園口決堤後，造成豫東、皖北、蘇北民眾的大量犧牲，影響範圍達3萬平方公里左右，實際受淹成災面積1萬3千至1萬5千平方公里。計1,250多萬人受災，390萬人外逃，89萬人死亡，淹沒耕地1993.4萬畝，經濟損失折合銀元1,091,762,000元。」（《蔣年譜》，第5冊，頁541）因此，《蔣年譜》不僅呈現蔣中正之功業，其所作所為爭議之處，亦有著墨。又如，《事略稿本》部分編者，或為避免讀者批評蔣中正迷信，刪去蔣基督信仰的一面。如1938年9月2日《蔣年譜》立一綱謂：「研讀《聖經》獲上帝啟示，以為戰

況或能漸穩」，日文謂：「閱讀《聖經》，適為去年本日上午所指示之〈詩篇〉第19篇，深信上帝必有深意、預示。乃以日本水災風災相繼不絕，『此乃敵軍惡貫滿盈所以天降其災乎』。而南北兩岸各陣地之日軍，昨日攻擊激烈，皆被國軍擊退，殺傷日軍甚多，以為『經此戰況或能漸穩矣』。」（《蔣年譜》，第5冊，頁590）對於蔣的這段思考，《事略稿本》或《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皆隻字未提，《蔣年譜》如實呈現，應有助於讀者觀察蔣之信仰或信仰對其作為之影響。

三、客觀呈現日記、檔案原文

《事略稿本》所錄蔣中正往來函電、日記，編者或為尊者諱而刪削或添補，或為言詞典雅、通順等考慮，將史料原文作更動。這樣的作法，有時雖不致影響史料大意，但仍可能造成讀者推想蔣中正心態時的些微誤差。《蔣年譜》則將蔣中正還原為客觀的歷史人物，對譜主持平呈現，不作評論，尤其所引用之日記、檔案忠於原文，原貌呈現，並加註來源，方便研究者查考。如1940年11月16日，蔣中正分析日本態度，《蔣年譜》立綱謂：「分析日本如一面承認汪兆銘政權，一面南進，乃自尋絕路。」日文謂：「記曰：『敵十三日御前會議，所謂處理中日戰爭問題之觀點獲得一致之通過者，可作二面觀也。其一為表面之宣

傳，……一面南進，自在意中，然此條絕路，倭自願投奔，於我無干也。』」（《蔣年譜》，第6冊，頁440）《蔣年譜》這段文字，完整引自「蔣中正日記」，不作刪改，《事略稿本》錄這段文字時，則將內容略作修飾，文末謂：「一面實行南進，然倭自欲投入此絕路窮途，余亦無法勸阻也。」（註2）比較起來，《蔣年譜》呈現蔣中正旁觀以待，甚至幸災樂禍的心態，《事略稿本》則呈現蔣有勸阻日本走向絕路之意，文辭些微差異，大意不變，對蔣心態的解讀卻可有微妙不同。

《蔣年譜》對於檔案、日記原文，常以引文呈現，有助於研究者徵引利用。對於「蔣中正日記」的反省錄原文照錄，尤為其特色。蓋蔣日記的反省錄，為該日記之精華，是蔣對自己所作所為的定期反省，較有系統的呈現蔣的考量、反思。《事略稿本》因各編者的體例略有不同，有時會摘抄蔣日記的反省錄，有時則予以省略。如1937年上半年的《事略稿本》略去反省錄，1938年則予抄錄。《蔣年譜》對於蔣日記每周、每月及每年的反省錄，不厭其詳予以抄錄，增添其史料價值。如1937年11月6日《蔣年譜》立綱「自記本周反省錄」，目文載：「一、金山衛防軍移防浦東，致原防空虛，凡接防部隊未到先行移防，必致大誤。上次蔚縣劉汝明始則不願讓防，繼則奉令撤防，而不通告接防部隊到著先行撤退，致被敵所乘。今次金山衛被敵登陸，以致牽動滬陣全

局，亦蹈此覆轍〔轍〕，此皆思慮不精；幕僚乏材，鑄成大錯，應切戒之。二、佈置配備不可以為敵必不敢來攻，應恃我有所備而不可攻也。三、軍事應由近及遠，先顧切戒最關緊要之點，然後再及其他，方能立於不敗之地也。」這段記敘，引用自「蔣中正日記」的本周反省錄，呈現蔣對淞滬會戰失敗的反省，對其部署如何失誤及自忖如何修正，有所陳述，讀者研究淞滬會戰軍事史時，參閱及此，當有相當助益。

四、參考較新研究

《蔣年譜》除收入蔣中正相關檔案、日記等一手史料，並參考較新研究，補充二手史料，以求與時俱進，敘述充分，尤期望在背景敘述與資料連貫上，有更為清晰的軌跡與脈絡。如中共大舉宣傳的「平型關大捷」，蔣中正在當時有所注意，卻並未過度強調。在過去國共「漢賊不兩立」的時代，於臺灣敘述「平型關大捷」，多與批評，《蔣年譜》則將蔣中正當時的想法如實記下：「山西平荊〔型〕關擊退敵軍，晉局或可轉危為安矣。」（《蔣年譜》，第5冊，頁408。）

平型關戰役雖對整體戰局影響不大，但日後卻為人所熟知，影響很大，《蔣年譜》因此對此事單獨立綱目，綱文謂：「平型關一帶日軍，為國軍夾擊消滅」。目文為求公正，參考了大陸學者楊奎松的研究成

果（楊奎松，〈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社會科學論壇》，2006年第1期，頁21-50），謂：「時中日軍隊於山西進行平型關戰役，第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遵奉第二戰區指令，配合行動，從日軍側背進行包抄作戰。本日，平型關附近日軍輜重隊、汽車隊，為第一一五師（師長林彪）伏擊消滅，日軍被殲滅數百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振奮人心，誇大宣傳，稱此役『將敵萬餘擊潰』、『俘虜千餘人』。該日遂被稱為抗日戰爭以還，中國軍隊第一場勝仗。」（《蔣年譜》，第5冊，頁407-408）這樣的筆法，未抹煞中共在平型關戰役的作用，也未受當時宣傳的影響，過度強調此役，就是依較新研究，如實呈現戰爭實況。

又如1938年2月17日蔣中正下令取消電雷學校，《蔣年譜》為提供讀者背景資訊，參閱學者張力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所發表之〈從「四海」到「一家」：國民政府統一海軍的再嘗試，1937-1948〉一文，對該校作背景介紹（《蔣年譜》，第5冊，頁482），讀者若欲進一步了解該校，亦可藉以得知能閱讀此文。

再如，《蔣年譜》提到蔣中正欲整理西南運輸處時，為提供讀者西南運輸處之概況，徵引了學者李君山所撰的〈抗戰時期西南運輸的發展與困境——以滇緬公路為中心的探討（1938-1942）〉一文（《蔣年譜》，第5冊，頁522），亦提供讀者進一

步查閱之線索。

楊天石是蔣中正研究名家，《蔣年譜》多處參考其研究，如提到抗戰時的中日密談，參酌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一書所收的相關文章（《蔣年譜》，第5冊，頁608）。

五、勾勒史事脈絡

《蔣年譜》的體例，為綱目式編年體，以綱提要勾玄，再於目文作較完整陳述。目文又兼採紀事本末，使讀者明晰事件之來龍去脈。如此作法，可使歷史事件不致被時間過度割裂，得適度呈現其前後脈絡。如1938年7月底至8月初，蔣中正連日關切張鼓峰事件，思考預測中的日蘇戰爭是否將要爆發。《蔣年譜》在7月20日的目文中，採記事本末，簡述該事件的來龍去脈：「張鼓峰事件為日本、滿洲與蘇俄的邊境衝突。7月9日，位在滿洲國國境東南端的張鼓峰（先生又稱「張高峰」），有十數名蘇軍士兵進入，並陸續增加兵力構築陣地。此地由日本朝鮮軍第十九師團負責守備，朝鮮軍接獲情報後，向中央提出『首先進行外交談判，若對方不理會，則以實力驅逐』的建議。日本大本營為使外交交涉有相當後盾，並預防緊急情況，於16日命令朝鮮軍『因應需要得將部隊集結在國境附近，但行使武力必須等待命令』。於是第十九師團尾高龜藏中將率部在20日前後集結在國境附

近。」（《蔣年譜》，第5冊，頁565）這樣的敘述，當足以使讀者在閱讀其他相關綱目時，較易理解其歷史意義。

又如1941年1月6日新四軍事件發生時，《蔣年譜》為此事立綱目，日文敘述該事件之背景：「民國26年10月，軍事委員會收編江南共軍為新編第四軍，以皖南涇縣、繁昌一帶為其駐防地，對日軍實施游擊戰。……其後，共軍在蘇北力量日漸壯大，至29年竟聯合魯南之第十八集團軍，對江蘇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韓德勤所率國軍，採包圍攻擊之勢。韓德勤迫不得已，於29年10月初，令第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率部進剿泰興縣黃橋之新四軍，……損失慘重。19日，參謀總長何應欽電令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一律開赴黃河以北作戰。嗣以共軍並無接受命令之誠意，乃復於12月8日，由何應欽電諭江南新四軍於12月底前，移至長江以北；至本年1月30日前，移至黃河以北，共同作戰。」之後再展開事件過程（《蔣年譜》，第6冊，頁478），足使讀者明晰整個事件脈絡。

六、結語

如上所述，相較於既有的蔣中正年譜長編相關著作，《蔣年譜》在增補史料、客觀呈現原文、參考較新研究等處，有其史料價

值。惟該作編纂時間迫促，且出於眾人之手，雖力求完善，仍有不足之處。如所採綱目體例，「綱以舉要，目致其詳」，易於突顯主題，卻難免遺漏一些重要文電。又如抗戰前期的《蔣年譜》以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為主要史料來源，這主要是軍、政史料，蔣對黨務的指示，雖亦曾參酌中國國民黨黨史館所藏史料，比例卻遠遠不如。可以說，抗戰前期的《蔣年譜》是以國史館所藏史料為基礎所編成，史料仍有部分限制。錯字亦仍難以避免，如周岳不作周晷，此雖常為各著作所混用，《蔣年譜》卻依然混而用之，應予改正。《蔣年譜》不足及舛誤之處必不僅如此，限於本文主軸，不再開展。

當今臺灣史學界，撰寫期刊論文、研究專書當道，對於撰寫年譜、編纂史料等工作，投入者相對較少。惟史料是研究的基礎，國史館作為國家最高史政機關，有必要對這個方面投入資源。就此脈絡觀之，視《蔣年譜》為國史館為奠定民國史、臺灣史研究基礎之重要著作，當不為過。

〔註釋〕

1.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臺北：三民書局，2002年5月二版），頁193-194。孫建民，〈論宋人長編體當代史的崛起〉，《史林》，1997年第1期，頁10-17。
2. 薛月順編輯，《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44冊（臺北：國史館，2010年7月），頁626。